

近代世界经济交往大潮中的契约华工

●张 坚

19世纪中叶,依仗炮舰的威力,西方殖民者从中国获得了其垂涎已久的特殊商品——契约华工(特指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以诱骗或掳掠的方式,从中国获得的廉价劳动力)。从1851年到1925年,总数达193万的契约华工被输送到海外^①。契约华工是继茶叶、棉布、白银之后,近代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又一重要“商品”。这一特殊商品的产生,既是近代世界交往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被更深地卷入世界交往的重要标志。

海道大通后,普遍的世界交往成为世界历史运动的主轴之一。经过两三百年的力量积蓄,人类的交往在18世纪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交往来看,此时“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着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力于工业生产。”^②然而,这时期的世界交往体系内部呈现出深刻的矛盾,特别是西方殖民者血与火的暴力交往方式引起了被深深卷入世界交往的落后民族强烈的反抗,成为阻碍交往向前推进的一大障碍。其中,罪恶的奴隶贸易及奴隶制成为世界人民向西方殖民者进攻的共同标靶。自18世纪末的美洲革命开始,大西洋两岸的废奴号角劲吹。迫于形势的压力,新生的美国在其北部

率先禁止了奴隶制的扩张,废除了奴隶贸易,英、西、法三国亦先后于1834、1845和1848年废除了各自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停止奴隶贸易。奴隶贸易的结束和黑奴的解放意味着美洲新世界最大的劳动力源泉的枯竭。业已形成并已高速运转的旧的经济交往体系——大西洋交往体系由于在劳动力环节上的革命性变革而必然要寻求体系的重建和突破。尽快解决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就成为突破口。

正当殖民者如饿虎觅食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第二个黑非洲时,人口众多,国力羸弱,内乱不止的中国成为了西方殖民者的首选目标。19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清王朝的统治已颓态尽显,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连绵不绝的兵燹和自然灾害,催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工业发展的先天不足,断绝了中国自己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借助海外减轻中国严重的人口压力,这一内部的张力,同世界市场亟需劳动力这一外部推动力交织在一起,像一支巨大的杠杆,一下子把中国人口摔进了世界交往大潮的漩涡之中。

在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中,经济交往是最重要的运动方式,契约华工作为经济交往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劳动力因素,从一开始产生到进一步发展,直至消亡,都对近代世界的经济交往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华工出洋的过程最先表现出这种作用。

在史籍的记载中,契约华工出洋在鸦片战争后被称为苦力贸易或贩卖、贩运猪仔。苦力贸易是继黑奴贸易之后,西方殖民者积累资本的又一捷径。在近代史上,围绕着苦力贸易,西方殖民者在太平洋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第一,大量的国家和地区参与苦力贸易。以秘鲁的苦力买卖为例,19世纪70年代,经营苦力进口贸易的公司中,除了秘鲁之外,英、美、法、荷、葡、俄等国以及它们所属的海外殖民地,都有洋行和苦力贩子参加苦力贸易^①。苦力贸易使西方资本持有者和美洲种植园主把关注的目光和大量的资本投向了太平洋。

第二,太平洋洋面上的船流量骤增。苦力贸易的巨大利润使西方殖民者趋之若鹜,航行于太平洋上的苦力船数量骤然增加。以美国各港口开往中国的船只变化为例:苦力贸易开始之前,美国商船是美洲来华船只的主要组成部分。从1784年至1815年,来华的美国商船共计484艘^②。平均每年有15.5艘苦力贸易开始之后,开往香港的美国船1846年为50艘(17297吨),1852年为174艘(96282吨),1859年为185艘(约178000吨)。绝大多数的美国船是空船装压舱物开到香港,装上“中国旅客”(苦力)后就开走^③。在世界近代史上,香港仅是美国船来华运苦力的几个码头中的一个,而且参加苦力贸易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尚有英、法、葡、西等国。可见,苦力贸易所引发的激烈竞争使一向平静的太平洋成了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热闹海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太平洋上这些满载契约华工的苦力船的航线,都是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呈扇形辐射太平洋沿岸各个地区。因此,苦力贸易对太平洋地区经济交往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首先,苦力贸易促进了太平洋航线的日

臻完善。在世界近代史上,历时两个半世纪的大帆船贸易于1815年结束后,美洲同亚洲的贸易主要以美中贸易为主,当时的商船所走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大西洋航线,该线从美国东海岸出发,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后,穿过印尼巽他海峡,到达广州。另一条叫太平洋航线,该线自美国东海岸出发,绕过合恩角,在太平洋上经夏威夷群岛,过菲律宾后,到达广州。由于美国西部在开发之前,该地区不仅没有像样的港口给过往商船补充给养,而且在商品供应上,该地区除了少量由印第安人提供的毛皮之外,乏货可易。因此,美中贸易的商船大多走大西洋航线,太平洋航线仅作为大西洋航线的补充而存在。苦力贸易的兴起改变了这一传统的格局。苦力贸易直接以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为目的,苦力船始终扬帆在太平洋洋面上,太平洋航线在苦力船的行驶中不断被人们熟悉并加以改进。先进的交通工具,如飞剪船和轮船先后进入了这条航线,大大缩短了太平洋两岸的航期。更为重要的是,太平洋航线周围的美国西部,夏威夷群岛以及菲律宾等地在契约华工的劳动中,不断地打破传统的封闭局面,发展交往所需的各种商品。太平洋航线在苦力贸易开始后逐渐取代大西洋航线,成为美洲与远东地区贸易的首选航线和太平洋两岸交往的重要渠道。循着这一条因苦力贸易而构建的交往渠道,太平洋两岸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可以说,殖民者驾驶的苦力船以其坚固的龙骨,撞开了太平洋经济交往的新时代。

其次,苦力贸易及其后殖民者对契约华工的剥削,使西方殖民者积累了进一步扩大交往的巨额资本。据统计,在1851—1875年间,总共有大约53.5万名华工被携掠、诱骗到拉美各地种植园和美国矿区,殖民者通过买卖这些华工,获得了高达8400万元的暴利^④。美国加州的华人矿工从1850年到1870年20

年间,交纳了4908416.29美元的税款给加州,该税款成为当时加州岁收的最大来源^⑦。另外,华工所完成的整治洼地和修建铁路两项工程,不仅改变了加州的历史,加强了加州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且这两项工程为加州创造了价值为2.897亿美元的财富^⑧。上述由契约华工所创造的资本,无疑给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加州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在秘鲁的“鸟粪时代”(1840年—1880年)契约华工为该地区创造了7.5亿比索的货币资本^⑨。这一笔资本使“秘鲁的经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得到了第一次强有力的推动。”^⑩由封闭落后的封建主义经济向开放的、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这一变化本身便是世界经济交往在秘鲁地区扩大的标志。可见,契约华工出洋的最初过程便加速了太平洋地区被卷入世界经济交往大潮的步伐。

然而,契约华工对世界经济交往的作用,决非仅止于它作为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商品,还更多地表现在其消费阶段,即他们在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生产劳动过程。

前往美洲的契约华工作为黑奴的继任者,他们用自己的血汗焊接了濒于断裂的旧的交往体系——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交往体系。

“糖业经济圈”是18世纪大西洋地区经济交往日臻密切的一个缩影,该经济圈由西欧提供资金和负责产品的销售,黑非洲出产劳动力商品,拉美地区负责甘蔗生产和蔗糖的初步加工,英属北美殖民地负责蔗糖生产中的辅助性劳动和粮食供应。上述各个地区以大西洋为中心,围绕着糖产品的生产进行地区分工,各个地区、各个生产环节之间唇齿相依,相互推动,相互制约^⑪。这种物质生产领域的跨地区分工,把欧洲、美洲、非洲纳入了结构性的频繁交往之中,是交往最结实、最具动力的基础。19世纪中叶,废奴运动和结

束黑奴贸易的变革,使“糖业经济圈”在劳动力供应这一重要环节上断裂而陷于瘫痪。契约华工的出现,不仅及时缓解了危机,而且赋予了该经济圈以新的内容。

在古巴,当地奴隶制的废除,使黑奴人数从1850年的40万减少到1870年的20万。黑奴在种植园中所承担的劳动份额也由1840年的77%减少到1871年的23%。但由于8万名来自世界农耕文明的代表国家之一——中国,身怀高超的种植技艺和加工技术的契约华工的输入,古巴的蔗糖生产不但没有停顿,反而逐年上升。60年代的蔗糖年产量突破了50万吨,到70年代,年产量达到了70万吨,输入华工成为解决当时古巴农业劳动力问题的“唯一途径”^⑫。在秘鲁,9万名契约华工的输入对该地区已陷入危机之中的农业“起到了一种挽救的作用。”^⑬在契约华工的努力下,19世纪70年代以后,秘鲁的蔗糖生产迅速发展,产量由1870年的251吨猛增到1880年的8万吨,10年间增长了差不多318倍^⑭。

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交通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人类的交往展现出光明的前景,顺应交往大潮的趋势,契约华工在欧洲殖民者的操纵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生产劳动。其中,南美种植园和美国南部的棉花、美洲大陆上一条条横亘东西的铁路线、沟通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水系的巴拿马运河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锡和橡胶等工业原料等等,堪称是契约华工在气势恢宏的近代交往巨图中勾勒出的浓墨重彩的几笔。

锡矿的开采是近代契约华工在马来半岛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它的规模一直与西方工业的进步息息相连。到1891年,在半岛上采锡的华工已达10万名以上,锡产量从1874年的4200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1.5%,增至1893年的39912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51.9%^⑮以后,马来半岛的锡产量长期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继锡矿之后,由于欧美各

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需要,马来半岛上的橡胶生产自1910年起,其发展呈迅猛之势。1914年,马来亚的橡胶产量为4.5万吨,占世界总量的36%,超过巴西,跃居世界第一位。以后一直增加,1920年产量达到19.6万吨,占世界产量的53%,这种“冠军”称号一直保持了30多年^⑥。锡和橡胶是马来半岛为世界工业提供的生命血液。也是近代世界交往中心——大西洋经济交往体系伸向东南亚半岛的两只有力的手臂。东南亚从一个仅以香料、胡椒等奢侈品同世界市场发生间接间歇交往的边缘地带,转变成为世界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造血基地,与此相适应,西方的工业(尤其是汽车、轮船制造业等)生产得到了来自太平洋地区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其发展与日俱增。这一结果与契约华工铺设的铁路、开凿的运河等开拓性工作一道,缩小了地球的范围,人类的交往有力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契约华工在太平洋地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构筑了太平洋地区内部、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经济交往的无形渠道(地区间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贸易需求)和有形渠道(输送到西方世界的糖、棉花、橡胶等原料和交通线的修筑等)。这些无形与有形的渠道最终把浩瀚的太平洋织进了世界经济交往体系之中。可以说,一个更广阔、更完善的世界交往体系正是近代契约华工出洋所带来的一个逻辑结果。

三

18世纪末期,尽管“世界正成为一个经济单位”,但由于这一单位在运行过程中的血腥掠夺性,导致了该经济单位的重重危机,敲响了殖民掠夺在经济交往中的丧钟。西方殖民者在太平洋地区重新炮制了一个“经济单位”,以契约华工代替了黑人奴隶来充当劳动力,世界经济藉此在纵深方面取得了突破。然而,此时的世界经济交往体系建立在契约

华工制这样一种“隐蔽的奴隶制”基础之上,其运转过程同样充斥着血腥的殖民掠夺,是与经济交往规律相背离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契约华工制又成为经济交往进一步发展难于逾越的门槛。

首先,殖民者对契约华工所进行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和非人的虐待,造成了华工惊人的死亡率。据科比·杜冯在《古巴华人研究》一书中估算,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高达75%。劳动寿命平均只有5年^⑦。《晚清海外笔记选》记载:(自1846年到1874年)前后不到30年,在古巴登岸的12万余契约华工,“仅存4万有奇,此外8万余人曾经回国者不过百中一二,余皆陨身异域,邱首难归,良可概矣。”殖民者这种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造成了大批劳动力的丧失,从根本上束缚了经济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契约华工制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反抗。契约华工以逃亡、自杀和武装暴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殖民者残酷剥削的不满。19世纪60年代末,华工的武装暴力使整个秘鲁都“笼罩着一种不安全感”,种植园主因为“无法防止他们(华工)在起义事件中进行报复,每个人都武装起来,种植园的每一住房都成了一所小小的军械库。”^⑧如此紧张对立的劳资关系使当地的生产扩大化而成为一纸空文。在20世纪初期马来半岛的种植园中,逃跑的契约华工通常占总人数的25%^⑨。缺乏了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美洲地区,由于殖民者故意压低华工的劳动报酬,当地的种植园主及农场主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他们大量地雇佣华工进行生产。为此,当地的劳动人民失去了不少就业机会,他们为改善劳动待遇而进行的斗争亦因此而遭到不小的挫折。由于受资本家和种植园主的教唆,当地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苦难的契约华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殖民者掀起的排华恶浪得到了当地不少劳动人民

的支持。排华恶浪给契约华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之同时,也引发了中华民族对西方殖民者所提出的经济交往的普遍反抗。

契约华工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使世界经济交往大潮在绕过黑奴制这一巨大的暗礁后,又涌进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瓶颈地带。

对于上述的严重后果,西方殖民者曾试图加以消除。美国在南北战争的第三年(1862年)开始,明令禁止美国人参加契约华工的贸易和运输,并且开始对拉美种植园中的苦力(契约华工)的痛苦表示关切与同情。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曾在1869年和1871年先后两次替秘鲁华工转递呈词,揭露和控诉秘鲁种植园主虐待华工的种种罪行,并在1869年10月19日在致秘鲁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了正式抗议^①。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对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的苦力贸易施加影响,极力地阻止苦力贸易的进行。1870年发生了葡萄牙的贩奴船“新佩内洛佩号”华工暴动后,英国的香港法庭还公开指斥了澳门的苦力贸易是“纯粹的奴隶贸易”,并判定受迫害的华工为恢复自己的自由而进行的暴力反抗是“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②

虽然从表面上看,英美为首的殖民国家在反对契约华工制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但由于殖民制度的存在和世界经济交往的客观要求是一组基本上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殖民者的掠夺本性决定了他们不愿也不能真正地给予被卷入交往大潮中的落后民族以平等的地位及和平的方式。

在美国本土上,种植园主与资本家从未给予契约华工以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同等的劳动待遇,相反,美国政府较早掀起了对华工的排斥、驱逐和屠杀。从而引发了1905年中国人民全国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像一把利矛戳穿了美国自我标榜的反奴隶制的西洋镜。英国虽然在驱使葡、西等国放弃罪恶的契约

华工制中颇为卖力,但1905年,由英国招募到南非特兰士瓦挖金矿的5万名契约华工的悲惨命运,用血的事实证明了英国殖民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使本国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另外,葡、西殖民政府虽然先后于1873年和1877年宣布废除契约华工制,解放契约华工,但此后拉美各地如火如荼的华工武装起义,反证了葡、西殖民政府的废除契约华工制只不过是蒙蔽世人的幌子。

无庸赘言,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契约华工制已成为阻挡近代经济交往大潮滚滚向前的又一拦路石。然而,黄河九曲终归大海,世界经济交往发展的不可遏制性,决定了这种阻碍只是暂时的。从这一意上,契约华工制的曲折发展历程仅仅是继黑奴制之后,又一次敲响的殖民掠夺的丧钟。

注释:

①、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一期。

②、[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下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③、④、⑨、⑩、⑫、⑬、⑭、⑰、⑱、⑳、㉑、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477页,第111页,第583页,第588页,第584页,第503页,第528页,第530页,第530页。

⑤、⑥、⑰、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199页,第244页,第44页。

⑦、⑧、朱杰勤主编:《美国华侨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89年,第53页,第77页。

⑩、参见陈雄章:《美国革命和重商主义的衰落》,载《广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四期。

⑬、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⑯、[英]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06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96研】